2025 年 1 月 外国语 January 2025
第 48 卷第 1 期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Vol.48 No.1
文章编号：1004－5139（2025）01－0100－10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博采众长 述而不作
——陈荣捷英译《近思录》注释体系研究

唐思珏，朱健平
（湖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摘 要：本文探讨了陈荣捷《近思录》英译本中注释体系的基本特点。研究发现，陈荣捷的注释体系由标题及标题注、随文注和脚注三类注释构成，具有两大特点：广泛选材，博采众长；严格翻译，述而不作。具体而言，他在注释体系中广泛采纳了朱熹的著作、历代《近思录》注本以及日、朝学者的研究成果，从而丰富了译本内容。在翻译注释材料时，他严格遵循“述而不作”原则，准确传达理学义理，为英语读者深入理解理学思想提供了便利。这种注释策略不仅为典籍翻译提供了良好示范，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播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陈荣捷；《近思录》英译；注释体系；述而不作

Extensive Selection and Transmitting Without Creating: Annotation System in Wing-tsit Chan'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

TANG Sijue，*ZHU Jianp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2，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nnotation system in Wing-tsit Chan'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ssu Lu*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 1967). Chan's annotation system, comprising chapter-rooted titles and preface notes, in-text citations, and footnotes, exhibits two notable features: extensive selection from diverse sources and strict adherence to the principle of "transmitting without creating". Specifically, his annotation system draws on a wealth of material from Chu Hsi's works, historical intra-lingual annotations and commentaries, as well as contributions from Japanese and Korean scholars, thereby enriching the translated text. When translating annotation materials, Chan rigorously follows the principle of "transmitting without creating" to accurately convey the essence of Neo-Confucianism, facilitating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Neo-Confucian thought for English-speaking readers. Such annotation strategies not only set an exemplary model for classical Chinese translations but also offer significant insights for the effectiv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Wing-tsit Ch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 annotation system; transmitting without creating

1. 引言

《近思录》是朱熹和吕祖谦合编的理学入门书，汇集了北宋四子周敦颐、程颐、程颢和张载的思

中国知网 https : //www. cnk:i. net

想精华，是理解儒学思想的重要作品。朱熹（1986：2629）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1967 年陈荣捷将其译成英语，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引起了西方汉学界广泛关注，为推动理学西传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朱子学专家，陈荣捷对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有着深入的研究，为儒家思想西传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向西方介绍东方哲学文化思想最为完备周详的中国大儒”（崔玉军2003：101）。《近思录》文字精练，思想深邃，陈荣捷在翻译时博采众长，添加了大量注释，帮助读者深入理解原文的深刻内涵。陈在添加注释时深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以传播儒家道统为使命，恪守“述而不作”原则，将朱熹的思想、《近思录》历代经典注本以及日、朝学者的相关成果纳入注释，形成了以我为主、兼容并包的多维注释体系，对忠实传播理学思想发挥了积极作用，备受赞誉（Wilhelm 1969：869；Cheng 1970：423）。陈荣捷述而不作的注释原则以及遵此而为的注释策略，对于提升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故本文拟对此作一尝试性探讨。

2. 述而不作：儒家经典的诠释传统

“述而不作”典出《论语》，是孔子对待学问态度的自我评价，历来为后世所阐发。一般认为，“述”比“作”易：“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者可及。”（朱熹 1983：93）即是说，“述”侧重继承，“作”侧重创始，“作”相对于“述”是更高层次的精神活动，对主体有着更高要求，故“非圣人不能”。然而，孔子只“述”不“作”的学术活动却得到了后世充分肯定。他以“述”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通过“传旧”传承中国文化，成就光照千古的伟业，为后世所景仰，被认为“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同上：93）。可见，“述”虽只是“传旧”，但其意义有时不亚于“作”。正因如此，述而不作的学术传统对后世经典诠释产生了重要影响。自孔子以降，通过“传先王（贤）之旧”进行传述和创作，成为儒家经典诠释的基本形态（李翔海2004：13）。述而不作因此也成为历代学者著书立说和诠释经典的基本原则。

以著书为例。著者常以既有文献为基础，根据自身需求并考虑时代背景，在整理编辑的过程中重新构建新的体系。这样的体系既承载着传统文献的旧有内容，又融入了著者基于经典和现实情境的新理解。中国传统思想正是在这种述而不作原则引导下不断推陈出新。《近思录》便是沿袭这一传统编成的经典之作。朱、吕以四子文本为基础，梳理了理学发展脉络，精选其中“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近思录》朱熹序）622 条，按照“循是而进，自卑升高，自近及远”（《近思录》吕祖谦序）的原则，归入“三纲八目”理学构架中，尽管只“述”未“作”，但贡献巨大，成为“我国第一本哲学选辑之书，亦为北宋理学之大纲，更是朱子哲学之轮廓。……支配着我国士人之精神思想凡五六百年”（陈荣捷2007：1）。可见，古人所谓的“述”其实不只是“述”，而是根据现实需要，以“述”的形式阐发新义，从而产生了“作”的实效。

述而不作在经典阐释方面尤为突出。历代学者遵此原则，以经典为依托，以注解为手段，源源不断地从既有文献中生发出符合现实要求的新意。他们围绕典籍展开的正义、集释、集注、注疏、译注、别裁等活动，构成了中国阐释学的典型范例。以《近思录》为例，其历代续编、补编、仿编、注释、集解、札记等后续著述多达百余种，还有朝、日学者的注释、讲说、著述百余种（严佐之2014：57）。他们依据述而不作原则，以原本为基础，通过注解拓展其内容，阐发其思想，深化其价值，使《近思录》在内容和意义上不断丰满。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正是通过这种整体“传旧”的方式不断演绎、丰富和发展起来的。

3. 博采众长、述而不作：《近思录》注释体系的构建原则

陈荣捷在翻译《近思录》时查阅了大量文献，博采众长，筛选出所需材料译成英语，并按不同的

中国知网 https : //www. cnk:i. net

功能编成各类注释，建构起了庞大的注释体系。其译注在原始材料的基础上作了适当的文字删减，但整体上遵循了 “述而不作”原则，未对所引材料妄加己意。这样既完好保留了新儒学的思想特质，又丰富了译作内容，还能使读者根据注释深入理解新儒学的义理。陈译注释按其位置和功能可分为标题注、随文注和脚注三类。

3.1 添加标题注，总揽各卷要旨

《近思录》共十四卷，原本均无标题，亦无标题注。朱熹（1986：2629）在讲授时总结了各卷纲目（见表 1），故后世刻印时通常给每卷加上了标题，但做法各异，如江永径取朱熹的纲目为题，叶采则对朱子纲目的语词作了删改（严佐之2017：1–2），用词规整简洁（见表 1）。此外，叶采简洁概括了各卷内容，帮助读者把握要旨。

表 1　《近思录》朱熹纲目与叶采篇目对照表

卷	朱熹纲目	叶采篇目	卷	朱熹纲目	叶采篇目
1	道体	道体	8	治国平天下之道	治体
2	为学大要	为学	9	制度	治法
3	格物穷理	致知	10	君子处事之方	政事
4	存养	存养	11	教学之道	教学
5	改过迁善克己复礼	克治	12	改过及人心疵病	警戒
6	齐家之道	家道	13	异端之学	辨别异端
7	出处进退辞受之义	出处	14	圣贤气象	总论圣贤

陈译为了保留原本风貌，方便读者整体把握各卷要旨，采用了一种平衡译法，即每卷均以朱子纲目为标题，而将叶采的篇目和概括文字以篇序的注解形式置于标题下方，标以 “YEH TS’ AI’ S TITLE AND DESCRIPTION”字样，以示该项内容非朱、吕原本所有；而且在译朱熹纲目及叶采篇目和篇序时，均能做到 “述而不作”，在保留原文形式的同时最大限度传达原文内容和精神。

例 1（第二卷）

朱熹纲目：为学大要

叶采篇目与篇序：为学此卷总论为学之要。盖尊德性矣，必道问学。明乎道体，知所指归，斯可究为学之大方矣。（叶采 2017：37）

陈荣捷译文：　　II：THE ESSENTIALS OF LEARNING

YEH TS’ AI’ S TITLE AND DESCRIPTION：On Learning. 111 sections. In this chapter are generally discussed the essentials of learning，for，having honored the moral nature，one must pursue inquiry and study. Having understood the substance of Tao and having known one’ s direction and objective，one can study the essentials of learning.（Chan 1967：35）

该卷讨论学道成圣之 “大方”。朱熹将其内容概括为 “为学大要”，叶采简化为 “为学”，并增加标题注，提炼主旨，为读者阅读指明方向。译者采用综合译法，先以朱熹纲目 “THE ESSENTIALS OF LEARNING”（为学大要）作为标题，再将叶采的篇目和篇序完整译出，以标题注置于标题下方，并以 “YEH TS’ AI’ S TITLE AND DESCRIPTION”明确该项内容的来源。译者将朱子和叶采的内容进行融合，既保留了原本风貌，又为读者把握该卷内容提供了引导。

可以说，添加标题和标题注是陈译的一大特色。译者在每卷卷首都添加了朱子纲目作为标题，并在标题下方以叶采的篇目和篇序作为标题注，而在翻译篇序时严格遵循 “述而不作”原则，完整保留叶采原文的内容。标题和标题注的添加，使译文结构更完整，主旨更明确，为读者阅读其后的语录提供了便利。

中国知网　https : //www. cnk:i. net

3.2 添加随文注，深化语录内涵

随文注在陈译中占有突出地位，是其注释体系的主要内容。陈在翻译某些语录时，为了丰富语录内涵，常常旁征博引，并在相应语录的译文后以正文的形式添加注释，而仅以空行和不同的字号与正文区分开来。这类注释来源广泛，长短不等，详略不一，但针对性强，可为读者理解语录提供清晰的思路。陈在翻译注释时同样遵循“述而不作”原则，力求准确传达原文精神。从材料的来源来看，陈译的随文注主要有三种途径：

3.2.1 大量引注朱熹著作，贯通两宋理学义理

陈译随文注中，取自朱熹的材料比重最大，内容最详细，与四子语录的关联性最强。《近思录》乃朱、吕合编，无论结构设计还是内容选择，无不体现着二人的精心构思，故以朱熹的文字解读四子的语录应是最合适的。再者，该书内容取材于北宋理学奠基者，以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文字注解，可使两宋理学义理实现无缝对接，延续文本的生命力。

具体地说，注解中所引的朱熹材料主要取自《朱子语类》《朱子文集》《四书章句集注》等书，其中以《语类》为重，占比最大。该书记录了朱熹与弟子之间的问答，内容丰富，析理精密，基本代表了朱熹的思想，且与《近思录》关联性强，是帮助读者理解其理学义理的重要著作。陈在翻译时也力求只“述”不“作”，在保留原文特点的同时传达了朱熹的意旨，甚至通过保留语录体特征，形象再现了朱子讲学论道的情景和南宋书院口授为主的教学方式。

例 2：君子主敬以直其内，守义以方其外。敬立而内直，义形而外方。义形于外，非在外也。敬义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为疑乎？（“为学篇”第 7 条）

陈译：（略）

陈注：“Straight” means to go straight up and straight down without being crooked in the slightest degree. “Square” means to cut sharply to make a thing square and regular.（Chu Hsi，*Chu Tzu yü-lei*，69：28b–29a）

“Square” means to handle a thing correctly in every way.（ibid.，30b）

Asked about the sentence，“As righteousness takes shape，the external life will be square.” Chu Hsi said，“Righteousness means the mind’s making a decision. As it makes the decision inside，the outside becomes regular and correct，and everything is in its right place.”（ibid.，29a）

If one has seriousness but not righteousness，what he does will be wrong. If he has only righteousness but not seriousness，there will be no foundation. How can he practice righteousness? In either case，the virtue is an isolated instance. Only when both seriousness and righteousness are established will they not be isolated.（ibid.，30b）（Chan 1967：44）

该例原文系《近思录》选自程颐《易传》中的语录（为节省篇幅，陈译从略），是程对《周易》中“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的解读，阐述了君子向内和向外的精神修养方法及其所达到的效果。陈在译完原文后，为了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语录的义理，从《语类》中选择了四段文字作为注释，用以展示朱熹对“直”“方”“义形而外方”“德不孤”等内容的理解，达到以朱释程的目的。原文分别如下：

朱子曰：直，是直上直下，胸中无纤毫委曲。方，是割截齐整之意。（朱熹 1986：1739）

又曰：方是处此事皆合宜。（同上：1741）

问“义形而外方。”曰：“义是心头断事底。心断于内，而外便方正，万物各得其宜。”（同上：1739）

又曰：敬而无义，则做出事来必错了。只义而无敬，则无本，何以为义？皆是孤也。须是敬义立，方不孤。（同上：1941）

中国知网 https : //www. cnk:i. net

四条注释中，前两条借朱熹之言阐述 “直”和 “方”的内涵；第三条保留朱熹语录的对话体式，展示其对 “义形而外方”的理解；第四条论述要做到 “德不孤”，必须同时做到既敬且义。可以看出，译者在设计注释时有详有略，重点突出；翻译时则遵循 “述而不作”原则，既解释朱熹的义理，又还原对话场景，将朱熹的理学思想和教学方式以注解的形式融入文本，在正文的基础上深化了程颐语录的内涵。细读《语类》发现，朱熹对程颐上述语录的解读有多条，陈注只选取了其中的部分内容，且即使是一条语录也未整句引用，而是仅截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可见，译者在设计注释时并未对原材料全盘照搬，而是根据需要认真筛选和调整。

总之，陈荣捷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从《朱子语类》等著作中提取大量信息，在译文中随译随注，不仅完好保留了原文的文体特征，而且适时引入朱熹对四子思想的准确阐释和权威解读，深化了原作的理学内涵；同时通过 “述而不作”原则，有选择地翻译所引材料的内容，这样既节省了空间，也突出了重点，并最终实现了以朱释程的翻译目的。

3.2.2 适度引注众家注本，赋予理学多维阐释

《近思录》问世后，其刻本迅速传遍全国，备受学者重视，并产生了大量注本，不仅为读者提供了辅助材料，而且极大地丰富了《近思录》的内容和形态，注入了新的思想，深化了其内在价值。因此，陈译随文注也部分取材于这些注本（尽管数量和篇幅较朱熹著作为少），且大多取自四种注本，即叶采的《集解》、张伯行的《集解》、茅星来的《集注》和江永的《集注》。这些注本凝聚了各位注者多年心血，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展现出不同时期的学者赋予文本的时代意义。

例 3：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则无序而不和。（“道体篇”第 17 条）

陈译：（略）

陈注： This explains the *Analects*，3：3，which says，“If a man is not humane，what has he to do with ceremonies? If a man is not humane，what has he to do with music?”（Chiang Yung，*Chin-ssu lu chi-chu*，1：7b）

The loss of the correct principle refers to the mind，while the absence of order and harmony refers to human affairs.（Mao Hsing-lai，*Chin-ssu lu chi-chu*，1：20b）

This is well said except that the idea is too general. It should have been said that humanity is the perfect virtue of the original mind and consequently there is the Principle of Nature [*T’ien-li*] in it. If the Principle of Nature is absent，human desires will run wild. How can there be any order or any resultant harmony?（Chu Hsi，*Chu Tzu yü-lei*，25：4a）（Chan 1967：17）

该例原文系《近思录》选自《二程粹言》中的语录，阐述了二程对仁与理的关系的理解。陈译添加了三条注解，分别引自江永的《集注》、茅星来的《集注》和朱子的《语类》。原文分别如下：

江永曰：此释“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也。（江永 1987：9）

茅星来曰：失正理以心言，无序不和以事言也。（茅星来 2014：23）

问：“仁者天下之正理。”朱子曰：说得自好，只是太宽。须是说仁是本心之全德，便有个天理在，若天理不在，人欲横肆，如何得序而和？（朱熹 1986：606）

三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语录作了解读。江永指出该句是对 “人而不仁……”句的解释；茅星来指出 “失正理”与心有关，而 “无序而不和”与事有关；朱熹则指出仁乃 “全德”，天理蕴含其中，若天理不在，人欲泛滥，便会无序不和。从译文来看，陈注除了补充 “人而不仁……”句的出处（即the *Analects*，3：3）外，内容、风格乃至顺序都基本与原文一致，如前两条的译文较为正式，朱熹的译文则更贴近日常表达，这里所体现的正是 “述而不作”的翻译原则。

叶采、江永等注本为历代最佳（张京华 2009：5），故能成为陈注的重要取材来源。而且，陈在翻译时尽量忠实传达原文的内容和义理，成功再现原文的风格特征。译者通过这种博采众长、述而不

中国知网 https : //www. cnk:i. net

作的方式添加并翻译注释，为读者理解文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思路。

3.2.3 间或引注日、朝文献，提供异域阐释视角

《近思录》在宋元之际便已传入东亚诸国，受到当地学者高度重视，研究成果丰富。张品端（2019a：28；2019b：26）指出，日、朝学者通过训点、翻译、注释、讲读、仿编等方式产生了大量本土特色的文献，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阐释特征。故陈注适度引入日、朝学者的观点，使其对《近思录》的解读超越本土文化界域，为英语读者提供了异域阐释视角。这方面材料主要取自佐藤一斋、金长生等人的著作。

例 4：近取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来之义，只于鼻息之间见之。屈伸往来，只是理不必将既屈之气，复为方伸之气。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复卦言“七日来复”，其间元不断续，阳已复生。“物极必返。”其理须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终。（“道体篇”第 33 条）

陈译：（略）

陈注： In this section，principle and material force must be considered as one. In his commentary Yeh Ts′ai distinguished them，but that was not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Master Ch′eng. Take breathing as an illustration of expansion and contraction. To exhale is to expand and to inhale is to contract. To breathe in a quantity of air and keep it in the lungs is to contract，and to exhale a quantity of air and spread it outside is to expand. When Yeh Ts′ai equates going as contraction and coming as expansion，he is following the *Book of the Changes*，in which the process of going up means to go or to contract while the process of going down means to come or to expand. This is different from the coming and going in breathing. However，the principle is the same.（Satǒ Issai，*Kinshi roku rangaisho*，ch.1）（Chan 1967：27）

该例原文系《近思录》选自《二程遗书》中的语录，阐述了二程关于生生之理、自然不息的观点。陈注取材于佐藤一斋的《栏外书》，原文如下：

佐藤一斋曰：此条理气须合一说，[叶采] 注分说非。程君本旨，屈伸以呼吸言之。呼为伸，吸为屈。吸取一团气畜在腹，是屈也。吐出一团气发在外，是伸也。注往而屈者，来而伸者，则就易言之。自下而上为往，为屈。自上而下为来，为伸。此与呼吸往来不同，然理则一也。（《栏外书》，见陈荣捷 2007：25）

佐藤一斋在此详细讨论了理气合一观，而陈译以述而不作原则传达了原文的观点，为读者理解该语录提供了不同的思路。

以上三类随文注，其来源在译文中所占比重不同，以朱熹著述为主，中国历代学者注本次之，日、朝学者文献虽有但不多。以《近思录》第二卷 “为学大要”为例，该卷共有语录 111条，约占全书语录总数的 1/6，陈译添加随文注 115 条，其中源自朱熹著述者 84 条，占 73%，中国历代学者（包括叶采、江永、张伯行等）注解者 30 条，占 26.1%（见表 2），表明译者在随文注中采用了多位学者的观点，范围广泛，材料丰富，但重点突出。这种做法既丰富了文本的解读视角，也做到了以中国本土学者特别是朱熹的观点为主。

表 2　陈译《近思录》第二卷随文注来源数量对比表

来源	朱熹著作	中国历代学者注本等						日、朝学者文献
		叶采	江永	张伯行	茅星来	施璜	陈埴	金长生
数量（条）	84	14	5	5	2	2	2	1
		30						1
占比（%）	73	26.1						0.9

注：施璜《五子近思录发明》和陈埴《近思录杂问》属于中国历代学者非注本类研究资料。

中国知网 https : //www. cnk:i. net

总之，陈荣捷大量引入后世历代学者对四子语录的多维阐释，以随文注的形式置于各语录下方，使原本仅具副文本性质的注释悄然实现了“正文本化”（李志强、冯志强 2020：110），俨然成为与四子语录同等地位的正文本。同时在翻译时严格遵循“述而不作”原则，准确传达各注释的内涵，将“外来”的注释与原本的四子语录在形式和内容上有机地融为一体。这样不仅深化了语录的内涵，丰富了语录的思想价值，实现了两宋理学义理的前后贯通，而且为英语读者理解四子思想提供了多维乃至异域的阐释视角。

3.3 添加脚注，架设沟通桥梁

陈译脚注篇幅不长，但数量繁多，内容丰富，信息量大，主要通过解释名词或概念、提供别解或别译、标注出处或来源等手段，在英语读者与中国文化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为深度传播理学思想扫除理解障碍。

3.3.1 解释名词或概念

这主要分为两类：

一是对历史人物或典籍名称等给出解释，但详略程度会因重要程度而不同。比如，《易》是一部重要的中国文化典籍，《近思录》中多次提及，译者便在首次提及处加注详述其构成和内容（见 Chan 1967：7）；而曾点、漆雕开等历史人物相对来说不那么重要，脚注的内容便简略得多，只是简单说明了他们的身份：“Tseng Tien was a pupil of Confucius and the father of Tseng Tzu.”和“Ch’i-tiao K’ai (540-c.450B.C.) was also Confucius’ pupil.”（同上：55）。

二是对文化词语或儒学概念等给出解释，如中国文化中的数字缩略语，译者通常会在正文中先直译这些术语，然后在脚注中解释其具体内涵。比如：

例 5：气无不和，四灵何有不至？（“存养篇”第 31 条）

陈译：All material forces will be in harmony and the four supernatural creatures will arrive.

陈注：The four supernatural creatures are the phoenix，unicorn，tortoise，and dragon. According to the *Book of Rites*，when harmony prevails throughout the world，the four supernatural creatures arise. See the *Li chi*，“The Evolution of Rites”（SPPY，7：12a）. Cf. Legge，tr.，*Li Ki*，II，384.（Chan 1967：137）

例 6：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道体篇”第 1 条）

陈译：The five moral principles of his nature are aroused by，and react to，the external world and engage in activity; good and evil are distinguished; and human affairs take place.

陈注：Humanity，righteousness，propriety，wisdom，and faithfulness.（Chan 1967：6）

例中“四灵”指象征和谐的麟、凤、龟、龙四种动物，“五性”指仁、义、礼、智、信。译者先在正文中分别直译为“the four supernatural creatures”和“the five moral principles of his nature”，再加注给出简要的解释，为读者理解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识。

3.3.2 提供别解或别译

译者在翻译某一概念或观点时，为了确保译文的准确性，常会在正文中提供一种译文后（多为意译）再添加脚注，提供直译的译文或其他学者或译者的解释，以供读者参考和理解。

例 7：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为学篇”第 40 条）

陈译：We want to be brave but cautious，and rounded in vision but square in action.

陈脚：Literally，“have a large gall（seat of courage）and a small heart.”（Chan 1967：57）

例 8：大抵学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为学篇”第 41 条）

陈译：Generally speaking，if one can achieve learning so naturally as to be beyond words，he will really achieve it in a natural way.

中国知网 https : //www. cnk:i. net

陈注：This is the general interpretation of*pu-yen* [no words]，but Mao Hsing-lai thinks（*Chin-ssu lu chi-chu*，2：22b）that it means“without being told，”as the phrase is used in the *Book ofMencius*，7A：21. This does not seem convincing.（Chan 1967：57−58）

例 7 在正文中将 “胆欲大而心欲小”意译为 “We want to be brave but cautious”，再加脚注直译为 “have a large gall（seat of courage）and a small heart”；例 8 在正文中将 “不言”意译为 “beyond words”，再加脚注提供其音译和直译的译文 “*pu-yen* [no words]”，并补充茅星来对 “不言”的解释。

总之，这类脚注试图在已经给出译文的基础上，提供其他可能的解释或译文，以最小的空间引导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

3.3.3 标注来源

译者在翻译某一概念或观点时，为了读者能够获取更多相关信息，常会添加脚注，标注更多参考文献。这又有两种情况：一是参考书中附录，如译者在译 “五气顺布”（“道体篇”第 1 条）中的 “气”时，添加了脚注 “*Chi*. See below，‘On Translating Certain Chinese Philosophical Terms，’ p.360”（Chan 1967：5），引导读者参考附录 “中国哲学术语翻译表”，进一步理解 “气”的内涵。二是参考书外的文献，例如：

例 9：懈意一生，便是 自弃自暴。（“为学篇”第 35 条）

陈译：As soon as one allows himself to be lazy，he is doing violence to his own nature and throwing himself away.

陈注：On doing violence to one’ snature，etc.，see the *Book ofMencius*，4A：10.（Chan 1967：56）

例 10：根本须是先培壅，然后可立趋向也。趋向既正，所造浅深，则由勉与不勉也。（“为学篇”第 33 条）

陈译：[CH’ ENG I] Fundamentally one must first cultivate and nourish himself. Only then can he determine his direction. If the direction is correct，whether his accomplishment will be great or small depends on how much efforts he makes.

陈注：In the original source，the *I-shu*，6：6a，this saying is assigned to Ch’ eng I.（Chan 1967：55）

例 9 脚注指出 “自暴自弃”出自《孟子》；例 10 脚注指出该语录出自二程《遗书》，为程颐语。这样，感兴趣的读者便可按图索骥，迅速找到引文出处或相关材料，为进一步理解提供便利。

总之，译者本着严谨的学术精神，对书中的文化知识、引文出处以及部分译文等做了脚注，为读者的阅读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辅助材料。同时，以脚注的形式叙述这类可读而非必读的文字，也使整个篇章的注释体系更有层次。

4. 陈译注释体系的基本特征

陈荣捷遵循博采众长、述而不作的翻译原则，在《近思录》英译中构建了一个内容丰富、层次清晰、分工明确的注释体系。总体而言，该注释体系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目的明确。这一注释体系并非译者随性之作，而是其长期规划、积极建构的结果，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导向性。陈长期生活在美国，深受中西文化的双重熏陶，并在美研究中国文化尤其是程朱理学多年，因而既熟悉朱子哲学的内涵和特质，又了解朱子著作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现状，还深知美国学者对中国文化译介的期待，这为其构建这一庞大的注释体系提供了有利条件。原作虽为四子语录，但系朱、吕所辑，整体上体现了朱熹的辑录思路和理念，因而尽管资料繁多，译者通过披沙拣金，含英咀华，形成了以朱熹著作为核心的注释来源体系，以实现其以朱释理的注释意图，因为在他看来，在所有关于《近思录》的评注中，朱熹的观点对意义的阐发最为清晰（Chan 1967：XI）。同时，为了帮助读者理解理学义理，而非进行哲学意义上的讨论（同上：XI），陈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自觉

中国知网 https : //www. cnk:i. net

采用 “述而不作”原则翻译随文注中所引的观点，试图让译文自己说话，而未擅加阐释，掺入己意。而且，为了向读者展示《近思录》的阐释历史，尤其是强化中国历代思想家之间的哲学联系，并方便英语读者进一步阅读（同上：XII—XIII），译者通过添加大量的脚注详尽标注引文来源。总之，无论是译注形式还是内容，甚至包括翻译注释所遵循的 “述而不作”原则，都是译者精心规划和选择的结果，体现了译者明确的目的性。

2）选材广泛。陈译注释材料来源广泛，不仅有中国本土学者的研究资料，而且有海外学者的研究资料。前者包括朱熹的《朱子语类》《朱子文集》《四书章句集注》等著作，以及叶采、张伯行、茅星来、江永等历代著名学者的优秀注本，后者则囊括了金长生、佐藤一斋等朝、日著名学者的作品，形成了以朱熹著作为核心、本土注本为拱卫、朝日文献资料为辅助的注释内容体系。这样，不仅实现了以朱释理的基本目的，深化了北宋四子的思想内涵，而且为深度阐释四子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多元视角。

3）分工明确。该注释体系尽管内容丰富，但结构井然，层次分明，标题注、随文注、脚注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共同形成功能多样、分工明确的注释功能体系。标题注包含叶采的篇目和篇序，总揽各卷要旨，起着提纲挈领、举纲张目的作用，为读者理解理学思想提供了便利。随文注大量引述朱熹著作、后世历代注本以及朝、日文献，不仅同时呈现不同时期的历史阐释和异域视角，而且通过将两宋理学义理实现无缝对接，深化了四子语录的思想内涵，延续了文本的生命力。脚注通过提供大量辅助材料，帮助读者解决文化理解障碍，并考证某些语句或观点的出处。三类注释以不同的方式实现着不同的功能，它们互为犄角，有机结合，完善了译作的阅读语境，满足了读者的阅读需求。

4）轻重有别。陈译加注并非平均用力或毫无章法，而是详略有致，轻重有别，有规可循。在注释类型上，随文注的篇幅明显高于标题注和脚注。在注释对象上，随文注主要集中在道体、为学、存养、齐家、圣贤诸卷，特别是开篇的道体卷和结尾的圣贤卷。在注释来源上，被引最多者是朱熹著作，其次是历代注本，朝日文献则只被偶然引用。即使是朱熹著作，被引最多者是《朱子语类》，其余则被引相对较少。总之，在陈译的注释体系中，随文注是重中之重，注释对象主要是道体、圣贤等卷，注释来源主要是朱熹著作，尤其是《朱子语类》。可见，陈译注释体系尽管复杂多样，但主旨非常明确，即：通过主要引述朱熹的观点阐释北宋四子的语录，实现深化四子思想内涵、贯通两宋理学义理的译介意图。

5）述而不作。述而不作作为我国传统的整理典籍和对待学问的基本原则，也是陈译构建注释体系的重要原则。一方面，他大量引述各类材料来阐述语录内涵，考证语录来源，从而使其意蕴和义理得到了丰富和深化。但在翻译注释时却并不随意发挥，掺杂己见，而是尽力克制自己，通过严格 “直译”，“客观”传达原文意蕴，传递原作者意图，让译文自己 “说话”，而不过度阐释。这样既完好保留了理学思想的基本特质，帮助英语读者多维解读理学内涵，又通过这种传统的典籍诠释方式增强了文本的权威性和学术性。

6）推陈出新。《近思录》作为北宋四子的语录集，虽在内容甄选、谋篇布局、前言后记等方面体现了朱熹的整体思考，但毕竟没有收录直接体现朱子思想的朱熹本人的语录。这一缺憾早已引起朱子后学的关注（严佐之2014：58）。因此，他们纷纷仿制朱熹构建的理学框架纂辑朱子语录，出版了多种以朱注四子的《近思录》注本（如江永的《近思录集注》等）甚至朱熹语录集（如张伯行的《续近思录》等）。陈荣捷在翻译中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他以朱熹纲目作为各卷标题，将大量的朱熹语录以随文注的形式集于译作中，形成了以朱子思想阐释北宋四子语录的奇妙格局，从而弥补了上述缺憾，使朱熹与四子可以跨越历史时空，在异域实现对话。不仅如此，他还将叶采的篇目和篇序作为标题注，在随文注中引入大量历代注家和日朝学者的研究成果，拓宽了原作视野，提供了多维阐释视角。因此，尽管他在翻译注释材料时尽量克制自己，做到述而不作，但他大量添加的注释无疑丰富了原作思想，客观上达到了以 “述”的形式阐发新义而至推陈出新的 “作”的效果。

中国知网 https : //www. cnk:i. net

5. 结语

陈荣捷翻译《近思录》发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但他博采众长、述而不作的注释原则以及遵此原则而采用的各种策略，对于当前中国典籍翻译和中国思想的国际传播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述而不作的注释传统孕育了许多优秀的经典注本，典籍翻译若能博采众长，广泛借鉴不同注本中的精华作为译作的注释材料，并按照“述而不作”的原则进行翻译，形成以原作的译文为核心、各类注释为支撑或参照的目的语文本，则不仅能够忠实传达典籍的思想内涵，而且能够结合时代需要，将历代注释的精华融入其中，实现以中释中、以旧传新的典籍译介效果。这样的翻译策略不仅能保持典籍原貌，避免主观阐释，各类注释作为补充和参考还可丰富译作的内涵和理解。通过这种方式，典籍翻译不仅能够满足读者对于原作的需求，还能突显其时代价值，为当下读者提供有意义的哲学和思想讨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注释策略有助于提升中国思想的国际传播效果，使其更好地融入全球的学术讨论和研究。

参考文献：

[1] Chan, Wing-tsit.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 The Neo-Confucian Anthology Compiled by Chu Hsi and Lü Tsu-Ch’ien*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2] Cheng, Chung-ying. Review: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 [J].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1970, (4): 423−427.

[3] Wilhelm, Hellmut. Book review: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 The Neo-Confucian Anthology*. by Wing-tsit Chan [J]. *Associationfor Asian Studies*, 1969, 27(4): 868−869.

[4] 陈荣捷. 近思录详注集评 [M].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5] 崔玉军. 陈荣捷和他的朱熹研究[J]. 中国哲学, 2003, (3): 100−110.

[6] 江永注. 近思录集注 [M].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7.

[7] 李翔海. 从“述而不作”看中国经典诠释的理论特质[J]. 天津社会科学, 2004, (5): 13−16, 76.

[8] 李志强, 冯志强. 基于注疏正文本化的辞书深度翻译研究— 以《尔雅•释诂》英译为例[J]. 外国语, 2020, 43(6): 107−115.

[9] 茅星来著, 朱幼文校点. 近思录集注 [M].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10] 严佐之.《近思录》后续著述及其思想学术史意义[J]. 文史哲, 2014, (1): 56−65, 166.

[11] 严佐之导读, 程水龙整理, 叶采集解, 朱熹、吕祖谦编. 近思录 [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12] 叶采集解, 程水龙校注. 近思录集解 [M].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13] 张京华辑校, 朱熹、吕祖谦撰. 近思录集释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9.

[14] 张品端. 朱子《近思录》在日本的流传及其影响[J]. 朱子文化, 2019a, (2): 28−31.

[15] 张品端. 朱子《近思录》在韩国的传播及其影响[J]. 朱子文化, 2019b, (3): 26−30.

[16]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7] 朱熹撰, 黎靖德编, 王星贤点校. 朱子语类 [M].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翻译研究话语体系构建研究”（21BYY006）

收稿日期：2023 − 08 − 13

作者简介：唐思珏，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研究、典籍译介研究。

朱健平（通讯作者），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研究、典籍译介研究。

中国知网 https : //www. cnk:i. net